

国际关系学书系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中国对外传播

张桂珍 等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中国对外传播

张桂珍 等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对外传播 / 张桂珍等著. —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5. 11

(国际关系学书系)

ISBN 7 - 81085 - 546 - 8

I. 中… II. 张… III. 中外关系—传播学

IV. G21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1732 号

中国对外传播

著 者 张桂珍等

责任编辑 冬 妮

责任印制 曹 辉

封面设计 源大设计工作室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话: 86 - 10 - 65450532 65450528 传真: 65779405

http: //www. cucp. com. 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9.5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1085 - 546 - 8/K · 357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序

杨正泉

○
序

我国对外传播事业正在向广度和深度展开,极其需要有关学术理论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传播学,尤其是对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日益活跃,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学者,翻译出版了西方传播学中一批有代表性的著作,新闻传播学、国际传播学和各类传播学科等相继建立,在传播学学术领域呈现出一派“百家争鸣”的景象。但总的趋势还主要是引进西方学者的传播学和传播理论。西方媒体业发达,对传播学的研究起步早,且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成熟的理论系统。而我国对传播学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目前对西方传播学和传播理论的引进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和阶段,它对我国传播学术理论的研究起到了强劲的助推作用,这在我国传播学发展史上将会是一个重要时期。但西方传播学毕竟不完全等同于中国传播学,尤其是新闻传播学,尽管在传播学的一些要素如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途径、传播效果和传播反馈等方法和技术层面上有共通之处,但毕竟新闻传播学是社会科学,各国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背景,在传播的目的、内容和

管理体制上有明显的差异。我们对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有助于开阔视野,借助国际先行的研究方法和传播理论,但最终还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推动建立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传播学和新闻传播理论体系,为中国传播工作实践和事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中国传播学的研究现状,总起来说,我认为,既落伍于西方,也落伍于我们自己的实践,作为我国传播学分支的对外传播学更是如此。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创始者当首推段连成(1926~1998)。段连成1948年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系,1949年后一直在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从事书刊对外宣传工作,做过编辑、记者、翻译,后来担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1985年离休后受聘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京大学和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合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等讲授《中国对外传播学》课程,并先后在全国30多个城市讲授对外传播学,到美国10多所大学做报告介绍中国。他内知国情、外知世界,既有实践又有理论。1988年他把在北京大学的讲稿整理补充为《对外传播学初探》(汉英合编本)出版,成为我国对外传播方面的第一本学术著作,1993年增添内容后以《怎样对外介绍中国》为题出版,2004年又集纳了他的主要文章和讲稿以《对外传播学初探》再版,他从理论与实践、中与外的结合中阐述了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凸显中国特色。9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朱穆之的《让世界了解中国》、爱泼斯坦的《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和沈苏儒的《对外传播学概要》、《对外传播的理论和实践》、《对外报道教程》,2005年出版了赵启正的“演讲对话录”——《向世界说明中国》。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这些领导者和实践者带头著书立说,主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着重总结中国对外传播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的概括,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对外传播学的基本规律。最近几年一些外宣工作者和研究学者有关对外传播学的论著陆续多起来,大大丰富和提升了我国对对外传播工作规律的理性认识,但无论是量还是质还不能适应我国对外传播的实际和需要,还远没有形成中国传播学的学术特色和理论体系。

张桂珍教授的《中国对外传播》是她多年在对外传播教学的基础上归纳提炼而成的。《中国对外传播》援引国内外大量的新鲜事

例,就对外传播的性质、任务、方针、原则、传播内容与方法等基本方面做了有益的探讨,具有广泛性、实证性、通俗性的特点,同时也显现出教学色彩;她多年教授国际关系,因此在对外传播的研究中,注重从当代国际关系、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大背景下,从国际视角看待我国对外传播,使之更有效地融入国际社会,具有前沿意识和国际意识的思维特点。《中国对外传播》的出版有利于拓展我们的思路,并提出了一些有待继续深入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读了《中国对外传播》,引发了一些联想。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和半个世纪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中国对外传播工作的要求、特色和特质,是认识和把握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基点。同时,对外传播学有极强的动态性,需要与时俱进地看中国,与时俱进地看世界。从事和研究当今中国的对外传播,以宽广的全球视野,准确把握时代潮流,是正确制定我国对外传播战略和策略、做好对外传播工作的重要前提条件。

作为一个历史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对外传播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个变化的动因,一是国内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开创了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新时期;二是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巨变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40多年的冷战对立结束,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时期;三是内外形势的互动性从来没有这样紧密,世界政治的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化,深刻地影响和牵动着国际社会,影响和改变着各国的发展战略,当然中国也不例外。这种内外大环境使我国的对外传播实践和研究出现了一些显著的时代特征。

第一,维护和平、谋求合作和共同发展成为我国对外传播的基本方针。我国对外传播的基点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对外传播是我国对外国和我国与外国之间的信息流动,传播过程是由主体国与对象国共同完成的,而且效果在外。当今世界,维护和平、谋求合作和共同发展,是时代的主流、国际社会的共识和世界人民的愿望。而中国社会制度的内在特质,注定了中国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内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

力的社会主义,对外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简明的解读就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社会条件下,决心走一条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的发展之路”。^① 从国内外大势定位中国对外传播,中国社会本质与世界形势的统一性,也就决定了以坚持和平、合作和共同发展统率我国对外传播工作。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对外传播工作是谋求对中国的客观、正确了解,谋求与世界各国和平、友好、合作和共赢,谋求多交友少(不)树敌、多栽花少(不)栽刺,也就成为对外传播的基调。

第二,以宽广视野看世界,对外传播要有新思维。现代国际社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存共赢。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一是要了解国际社会,二是要取得国际社会的了解、信任和支持。这种国际形象的塑造,改变了历史上传统的对外传播观念:1. 不再只依据本国规则介绍中国,需要熟悉和遵循国际游戏规则。2. 不再只从本国需要出发介绍中国,必须善于从全球的角度定位传播的内容和方式,提出和解答问题,寻求主客观需求的最佳结合点和效果的最大化。3. 不再只从本国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介绍中国,必须善于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尤其是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处。我们既认定资本主义是必定被代替的社会制度,但又是现实的社会制度,而且依据其经济技术和信息的实力处于优势地位,我们必须面对和适应现实,学会与之长期打交道。4. 不再只是以中国的视角看待世界,也要以外国和全球的视角看待中国。研究中国的对外传播,确定其走向,应该从内外关系的联系和互动中交叉定位。

第三,经济文化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凸显。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客观要求淡化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凸显了经济和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也就凸显了经济和文化在对外传播中的功能和亲和力。我们要重视和研究这一新的趋势,做好对外传播工作;我们要以正常的心态对待日益增多的经济摩擦、文化碰撞,提高应变和解读能

① 曾庆红在“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2004年9月3日。

力,善于以国际规则维护国家经济、文化利益和安全。

在新的形势下,强权霸权不得人心,搞政治图谋不得人心,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不得人心,已成为世人的共识。但从形势的另一方面看,单边主义更膨胀了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成为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这种强权和霸权也带有时代的特征,如果说是结束了传统的两极对立的冷战思维,那么却膨胀了单边的冷战思维,其特点是为肆无忌惮地谋求霸权和国家战略利益,干涉别国内政,颠覆别国政权,利用强势舆论造势、推波助澜。综观近期国际事件,除了赤裸裸的武装干涉,更多地表现为经济、文化潜移默化的渗透,表现为“民主、自由”幌子下的扶持反对派,利用选举等机会煽动民众搞“街头政治”,这种新形势的“和平演变”方式,在一些国家屡屡得手。我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形势和经济风险。我们的对外传播不搞政治对立,不搞意识形态的输出,但绝不可放松警惕。反对“和平演变”、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是对外传播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要研究这种斗争的新特点,在涉我问题上,有针对性地向世界介绍中国,进行及时、有效的舆论斗争。

第四,从中国的发展变化中调整对外传播。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对外传播经历了打破西方敌对势力“封锁中国、抹黑中国、颠覆中国”的图谋时期,长期处于弱势防范地位,处于微弱的呼喊地位,处于舆论的抗争中,形成了我国对外传播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在发生变化,日益显示出大国地位和作用。中国不但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也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国,是一个融入世界对世界负责任的、有影响的大国,这种变化不断改变、提升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也改变着我国的对外传播的走向,对内主要服务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外贡献于构建一个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国际社会。我们应该明显地意识到我国正在悄悄发生的变化,今天的对外传播应该有别于历史的某些特征,不仅应该调整传播工作的方针和方式,也应调整工作心态。国际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各自以一种不同的视角瞩目中国,依据自己的利益关系作出评估。我们要善于与国际交往,善于与大国交往,

善于与周边国家交往,善于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交往,妥善对待复杂的国际关系,无论是“以我为主”的宣传报道,还是报道外部世界,都要采取分析和区别对待的态度。例如,对外传播工作的客观形势决定着我們主要是在和西方大国打交道,但不可疏忽中小国家的需求,尤其不可疏忽小国利益和弱国心态,区别对待,谨慎从事,警惕出现“大国心态”,妥善处理与他们的相互利益,谋求与他们的合作共赢关系,建立良性互动的国家关系。

第五,制定战略,整合资源,构建对外传播的大格局。当今各国都在瞄准和平与发展的机遇,中国有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利益追求,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更需要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有自己特殊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对世界事务有自己独立自主的看法和主张。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外部形象的塑造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奠定国家形象的基础是以经济为主导的综合实力和正确的对外政策,而舆论是先导和保障。目前从国家基础和传播状况都具备了整体规划对外传播的条件,需要实施整体传播方略:1.对全局进行缜密研究,制定对外传播长期规划和发展战略,明确目标和措施;2.整合对外传播资源,目标统一,发挥优势,协同作战,形成合力;3.建立统一高效的管理、运行机制,提高对重大问题的科学决策能力,组织力量进行战略研究,加强计划性和预见性;4.形成以大众传媒为主体、综合对内对外宣传力量、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场所、调动政府和民众广泛参与的对外大传播格局。

对外传播学的动态性研究是其重要特征之一,它不但离不开实践,而且必须面对实践,及时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尤其是重大的带有方向性的问题,才能对实践更具有推动力和指导性,传播学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在传播学的学术理论研究中,对外传播的中国特色、时代性和实践性应该是经常的重点研究课题。

2005年5月24日

[杨正泉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

目录

CONTENTS

◎
目
录

序 / 1

第一章 对外传播的意义 / 1

第一节 全球化与对外传播 / 1

第二节 国际传播中的国家形象 / 12

第二章 对外传播的地位与作用 / 32

第一节 对外传播的实质 / 32

第二节 对外传播工作的地位与作用 / 45

第三节 对外传播的任务与原则 / 51

第四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传播实践 / 54

第三章 对外传播的学科特征 / 63

第一节 传播学观念——题中之义 / 63

第二节 对外传播中的艺术观点 / 80

第三节 对外传播中的国际视角 / 102

第四章 对外传播的基本要求 / 111

第一节 对外传播的新思维 / 111

第二节 对外传播的针对性 / 120

第三节 对外传播的真实性 / 140

第四节 对外传播的有效性 / 143

第五章 对外传播的基本内容 / 152

第一节 全方位介绍中国 / 152

第二节 重点报道经济发展 / 164

第三节 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 / 173

第四节 充分展示中国的旅游资源 / 196

第五节 关注各种外事活动 / 203

第六章 对外传播的大视野 / 211

第一节 改革开放需要对外大传播 / 211

第二节 培育对外大传播意识 / 213

第三节 对外传播任重而道远 / 218

附 录 / 221

后 记 / 1

第一章 对外传播的意义

第一节 全球化与对外传播

一、全球化时代“低级政治”作用凸显

全球化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特征。

“全球化”是个政治、经济、传播学的概念。第一个明确提出“全球化”概念的是布热津斯基。1969年,他在《两代人之间的美国》一书中首次使用“全球化”一词,提出世界正向全球化社会的方向发展。然而,布热津斯基所谓的“全球化”其实是美国化。1980年,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提出了“全球意识”的概念,指出:“第三次浪潮促使那些拥有比国家利益更大的利益集团的纷纷兴起。这些集团正在形成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这种意识形态有时叫做‘全球意识’。”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化”术语在世界上加速流行。9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地球的各个角落扩展,用难以阻挡的力量向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施加影响。1994年2月,西方七国集团的信息部长在布鲁塞尔会议上正式提出名为“全球信息基础结构”计划,提倡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无障碍”流动和“自由交换”,最终实现

“全球信息一体化”。其实质是要建立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信息霸权。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也是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要求。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传播使世界经济的互相依赖性增加”。经济全球化主要体现为资本全球化、产品全球化和通讯全球化。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具有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性统一规则的国际组织。

资本的全球化在 20 世纪下半叶找到了新的载体,这就是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① 在迈入 21 世纪的时候,人类开始了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信息化时代正向我们走来。

经济信息化指的是信息产业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兴起和发展这一重要的现象和趋势。经济信息化反映的是社会生产力所达到的高度和水平,经济全球化则反映的是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变化,是属于社会经济关系的范畴。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趋势。^②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经济全球化得到有力的推动。

日本《朝日现代用语》对信息社会的定义是:“信息社会指的是信息成为与物质和能源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加重要的资源,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信息为核心价值而得到发展的社会。”

从科学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角度看问题,在科学引起社会变革的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已经发生过三次。第一次科学革命发生在 17 世纪,其主要特征是科学同神学的分离,它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一起促成近代社会的出现。第二次科学革命发生在 19 世纪中叶,其主要特征是科学同直接劳动的分离,科学因此而进入社会生产力。第三次科学革命发生在 20 世纪下半叶,其主要特征是科学技术开始成为一种产业,并作为一种同直接经济活动分离的力量,按照合规律性的

① 赵可金、倪世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国际政治》,载梁守德等主编《伊拉克战争后的国际政治走势》,军事译文出版社,2004 年版,第 60 页。

② 王怀宁:《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趋势》,载《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东方红书社,2001 年版,第 110 页。

要求规范经济、权力、道德乃至一切文化。^①

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基础,不仅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科学技术的普适性使其成为沟通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同语言”。在各种新兴科学技术中,信息技术对国民经济乃至社会生活发挥着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作用,信息传播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名副其实的神经系统和重要动因,推动着国家间和地区间的接触和沟通。

全球传播不是政治上的全球化,更多地是讲一个传播网络,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是通过卫星,二是通过互联网。全球传播是在全球性媒体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极大地缩短了各国的时空距离,各种文化、思想的相互吸纳、碰撞,使政治意识、价值观念不断得到更新。所有这一切,有利于增进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沟通和合作;有利于形成国家之间政治上的和平共处,发展和谐健康的双边、多边关系;有利于形成经济上互惠互利的合作局面,推动国家经济对外开放,自觉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在此背景下,表现为经济、文化、人口、环境等所谓“低级政治”内容日益突出,使基于人类共同属性、共同追求的共同判别意识和价值体系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逐步形成。如和平、稳定、发展、合作、民主、人权等,已经成为国际舆论的公共标准。此外,也确实出现了某些具有全球性或全人类性的文化现象或课题,诸如生态平衡、环境问题、气候变暖、恐怖主义、贩毒行为等。

缺乏必要的国际政治共识和多元文化的对话,经济全球化成功的程度就很难实现。当“道德文化资源可以转化且实际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经济资本”^②时,各国普遍重视“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协调与平衡。

二、融入全球化

1. 积极融入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其本源上的原因是国

① 《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东方红书社,2001年版,第217页。

② 同上,第242~243页。

家之间经济条件的差异性和相互依存的需求性。

所谓国家的相互依存,是指国家处于既独立又融合的状态,这种状态是社会生产力和人类交往发展的结果。相互依存带来相互合作的需要。在相互依存的状态下促进世界的发展,既要尊重国家主权的平等,又要进行卓有成效的双边、多边合作和全球参与下的国家共同治理。信息技术将人类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随着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国家对国际社会的联系和依赖呈不断加强之势。

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全球化一方面可能是机遇和利益,另一方面可能是风险和灾难。

1997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制转型国家有警示作用,提出了如何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加强防范以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问题。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常识是:收益与风险成正比。经济全球化尽管也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定的冲击,但从总体上看,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关键取舍于发展中国家自己。这取决于:对全球化有没有全面的认识,对本国融入全球化有没有充分的准备,有没有趋利避害的切实措施,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经济政策,等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的主动行动,也是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经济年增长率9%,是世界经济年增长率的3倍,就是充分利用了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战略机遇,以自主而开放的姿态、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智慧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世界进程,不断融入国际经济的结果。

从中国来讲,全球化,总体有利,但压力也很大。

中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在经济条件未达到 的情况下,就不能跨过资本积累、资本运动。我们现在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资本积累、资本运动,利用资本的力量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过去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冷战思维的支配下,较多地是从对立中去认识,更多关注的是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之间的区别。面对全球化,应该更多地思考如何从相互联系中去认识资本主

义与社会主义,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然后社会主义又会怎样影响资本主义(“二战”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就是受到影响的结果)?

不同性质的社会的文明存在着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竞争发展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文明都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趋势,但不是现实。在现阶段,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在世界发展中仍处于主导和优势地位。在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它是不会灭亡的,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当前的使命首先是谋生存、谋发展,而不是谋替代。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将长期共存,既相互抗衡又相互吸收,共同作用、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我们在把握现实社会主义时,必须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与政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上去认识社会主义,从经济政治文明的统一上去认识。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从资本主义肌体上获取营养,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一切文明成果,只有这样,落后国家才能跨越“卡夫丁峡谷”。

2. 积极融入国际社会

国家融入国际社会的动力来自对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的需要。大多数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体,决定国际社会的发展潮流。

全球化条件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使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具有双赢性。顺应历史潮流,融入国际社会的发展大潮,在世界的繁荣中谋求自身的发展,并以自身的发展推动世界的繁荣,已成为每个国家重要的理性的选择。

作为一个日益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国,中国不能游离于各种主要的国际机制和规范体系之外。尽管面临困难很大,例如,全球化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进行,当代世界经济三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都是在大国建议指导下工作,而国际规则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的诉求,对强者更有利,等等。但是,参与国际体系,是中国未来改造旧的国际秩序并提出倡议的支点。只有更

多地考虑全球事务,更好地负起建设性大国的责任,中国才能更好地表达自身的需求。

过去很多年,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曾经长期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著名学者秦亚青认为,中国在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完成了从一个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的革命性大国,到维护国际社会稳定发展中大国的国家身份的转变,也完成了对国际体系从“零向认同”和“负向认同”到“正向认同”的转变。^①

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基本上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国际影响力较小。

1972年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为标志,中国开始初步参与国际体系,陆续加入联合国下属组织。1978年以后,我国完成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战略的转变,与此同时,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作出了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化为“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判断,国家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开始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开放的重点是面向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对外战略也摆脱了冷战对抗思维模式的束缚,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有了明显增强,但是,其作为国际社会的次要角色没有根本改变。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面临苏东剧变的冲击和西方的制裁,中国外交更多地强调执行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方针;90年代后期,随着形势的好转和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外交更多强调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融入国际社会,更强调有所作为。中国政府积极担负起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的重大责任,加入了联合国体系中几乎所有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甚至主动提出了建立多边机制的倡议,并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充任重要角色,中国在非政府组织中的席位也从1977年的71个猛增到上千个。顺应经济全球化的

^①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11页。